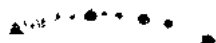

中外名记者丛书

萧 乾

傅光明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1995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顾景政

封面设计：郑炳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萧乾/傅光明编著. -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，1995.12
(中外名记者丛书)

ISBN 7-80002-803-8

I. 萧… II. 傅… III. ①萧乾-评传②萧乾-作品集 IV.
①K825.6②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8581 号

萧 乾

中外名记者丛书

著 者：傅光明

出版者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(北京金台西路2号)

199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50×1092 1/32

发行者：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北京科技印刷厂

印 数：7000

印 张：7 字数 160 千字

定价：9.50 元

目 录

人物评传	(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童年	(1)
北新书局起步	(4)
大学生涯	(12)
与埃德加·斯诺	(20)
与巴金的交往	(27)
旅行记者生涯	(37)
英伦岁月	(58)
欧战风云中的中国记者	(85)
恋家的鸽子	(96)
生命从七十岁开始	(116)

作品选编	(127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流民图	(127)
血肉筑成的滇缅路	(142)
血红的九月	(150)
矛盾交响曲	(158)
银风筝下的伦敦	(163)
南德的暮秋 (节选)	(172)

在洋山洋水面前·····	(196)
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·····	(204)
生平年表	(215)

人物评传

童年

萧乾，原名萧秉乾，1910年1月27日出生在北京城东北角一个汉化了了的蒙古族贫民家庭。萧乾祖上是19世纪从蒙古迁移到北京的，也许来自于草原，或大兴安岭。他清楚地记得童年时代阴历新年的祭祖，三个穿游牧民服装的木像代表祖先，贡品有奶油、干酪等许多汉人不吃的东西，他还看到过一本用蒙文写的家谱，这些是他能记起的与蒙古人的联系。他的蒙族身份一直隐瞒到解放以后，因为少时自卑，聪颖的萧乾知道，所有少数民族都被人视为野蛮人而备遭歧视。他小学同班有个穆斯林，人们就给他起了外号叫“小穆罕默德”，并用猪和猪肉来开他的玩笑。萧乾的祖父有三个儿子，他父亲萧秀林排行老大，是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。萧乾出生前一个月，他就离开了人世。四五岁的时候，两个叔叔也死了，小萧乾不得不和可怜的寡妇妈妈寄居在三叔的儿子（三堂兄）家。

萧乾的童年是在孤寂、痛苦中度过的。妈妈非常爱他，可他却很少见到她，她得外出给富人家当佣人以维持生计。她只在每个月底带着三块钱工钱回家一次。实际上，萧乾是由那位老处女大堂姐抚养的。他把她视为半个母亲，她又矮又

胖，心地善良，常常给萧乾讲神话故事，为他唱北京民谣。三堂兄是唯一能养家糊口的人，可老没工作。找到工作后，心绪一好，就会拉起胡琴，唱上几段京剧。这时，萧乾就得为他擦皮鞋或自行车。他稍不顺心，就会找借口抽打萧乾，命他跪在一株盆栽的桃树前。母亲感到很对不住儿子，可又不敢说什么，有时只是背着三堂兄给儿子端上一杯热茶。

到了冬天，日子更难过了。政府或一些慈善机构为穷人提供免费稀粥。三堂兄失业时，稀粥就成了维持生计的主要依靠。萧乾经常天不亮就被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拽出来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加入到长长的领粥的队伍。他还记得有位流落街头的白俄，被从队伍中轰了出来，拿着那只空盆朝东正教堂踱去。几天以后，他饿死在街头。这给萧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没有祖国更悲惨不幸的了。少年萧乾的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感觉，自己没有了家，过着寄人篱下、忍气吞声的艰辛生活，那滋味不会比那白俄好受的。

萧乾是个顽皮、淘气的孩子，他像《篱下》里的环哥一样，经常给母亲惹祸。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，将来出人头地，给家里争气。六岁时，母亲把他送进一家在尼姑庵里的旧式学校（私塾），必须一章一章地背没有注解的《论语》。先生很残忍。萧乾几乎每天都要挨打，有时是因为交不上束修，但更主要是因为妈妈没给先生及时准备逢年过节所必备的礼品。

一天，萧乾二叔的儿子（四堂兄）告诉母亲，有所美国教会学校招收工读学生，可得到免费教育。对穷人家想受教育而又没钱上学的孩子来说，这确是福音。母亲当即同意，并由四堂兄领着，萧乾上了那所长老会教会学校，即崇实小学。那里有一个地毯厂、印刷间和奶厂，工读生上午工作，下午学习。萧乾在地毯厂干了四五年，离开时，已能织一手地道

的土耳其地毯。

就在萧乾第一次领到工钱（一块五毛）的那一天，母亲在家中去世了。这本身即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悲剧。萧乾的自传体小说《落日》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真实经历，他把艺术的魅力注入小说，使其更加真切感人。除了织地毯，萧乾还在安定门外放过羊，为阔人家送过羊奶。童年痛苦的经历造就了萧乾任性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，无形中培养了他自强不息，自我奋斗的精神。就是靠了这种精神，他终在十四岁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，真正开始独自在这个世界上流浪，漂泊。

萧乾童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此起彼伏之时，海关、邮政局甚至北京的警察全控制在英国人手里。军阀们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，不惜作起主权交易，以换取外国武器。中国人民，特别是学生，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愤慨，而军阀对激进、爱国的民族主义壮举却深恶痛绝。

1919年，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“五四”学生爱国运动。当时，萧乾才九岁，未能参加。“五四”运动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。1925年5月，一日本纱厂的罢工领导人被杀。上海学生在外国人控制的租借地南京路上举行了示威游行，几名学生被杀，点燃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。萧乾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游行，在那民气激昂的日子里，他萌生了政治觉悟。游行持续了数月。对于这段经历，萧乾在半自传体小说《昙》中有所描述。就在这时，萧乾阅读了一些宣传全人类解放，揭露不平等条约的小册子，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朦胧产生了要当一名革命家的愿望，以为单凭一股原始的反抗情绪，就能一举消灭世上的不公正。他加入过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，从事宣传活动，扮演了一个勇敢、坚强的“小革命者”的角色。

萧乾是个幸运儿，要是没有那位靠自我奋斗读过齐鲁大学、娶了洋太太的四堂兄，他也许会踏上另一条途路。四堂兄的反封建意识和强烈的叛逆性格，在萧乾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那位洋嫂在他五岁时，就教他读开了英文《圣经》。虽然萧乾最终没有皈依基督教，但他对《圣经》中的许多章节都能熟读默诵，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，以致深深影响了他的爱的哲学。即使在萧乾的反宗教小说里，他讽刺、嘲弄、揭露的主要是那些中国、外国的宗教伪善者，而非基督教本身。萧乾不相信上帝。

我愿把少年萧乾比喻为人生路途上刚刚起步的孤独长跑者，他不知前边的路到底有多长，是否能到达尽头，只是任性地向前跑着跑着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，都不曾停歇。

北新书局起步

萧乾对文学发生兴趣，是从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开始的。1926年暑假，萧乾在《世界日报》上看到一则广告：新成立的北新书局要招一名练习生。经过面试，萧乾得到了这份工作。这是“五四”运动后期带点同人性质的新型出版社，出过鲁迅，周作人，刘半农，江绍原，徐祖正的作品。鲁迅还为他们编了个刊物——《语丝》。

练习生的工作就是打杂，有时给作家们送稿费，有时跑邮局。经常干的是校对，尤其是《语丝》和多种图书。搞上一天，油墨气味常令他发昏。萧乾最怕给人送稿费，那么厚一叠钞票，万一丢了可赔不起。他每次都是让同伴用手绢把钱绑在手腕上，一路骑车便死死盯住它。他去过许多趟八道

湾周家，还特别喜欢去中剪子巷谢家，因为他和冰心的弟弟为楫在崇实从小同班同学。他常告诉冰心书局老板李小峰又扣了她多少版税。冰心对这位小伙计也格外热心，收下钱并不马上让他走，总留他坐上一会儿，喝口水，亲切地问长问短。

晚上，萧乾就在自己的小屋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书局借来的书，从尼采、马克思、易卜生、奥斯卡·王尔德的著作，到刚从巴黎归来的张竞生写的《性史》，涉猎很广，萌生了对文学的兴趣。这时，他对社会、人生的认识是模糊的，抽象的，像所有青年人一样，什么是生活和如何生活这类问题萦绕在脑际。他开始学会思考。他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，而是把易卜生戏剧《国民公敌》的最后一句“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”当成座右铭。这句话成了少年萧乾生命哲学的支柱，更增添了他自我奋斗的勇气。一个人在生活中选择什么样的哲学，同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。作为穷人家的苦孩子，他当时的初衷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光宗耀祖、封妻荫子的思想并无二致。及至他读了华林长仅几十页的《新英雄主义》，思想的视野才倏忽打开。实际上，尼采的哲学对萧乾也产生过影响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萧乾当时潜意识中或许希望把自己塑造成新的英雄，哪怕这种思想是一瞬间的。因为读过这些书后，萧乾便在兴奋之余带领另外两个小徒弟搞了一次有趣的罢工，提出的是“徒弟们不吃剩饭，每礼拜轮流休息一天”的可怜要求，扮演了一次英雄，结果丢了工作。

在书局时，老板交给过萧乾一个差使，让他到红楼北大图书馆去抄书，不许漏一个字，错一个字，连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样。这不但对萧乾日后从事文字工作是极好的训练，也使他精读了一些作品。徐志摩译的《曼殊斐尔小说集》就是他一篇篇从《小说月报》、《现代评论》等刊物上抄下来的，那

是他最早精读的一部集子。曼殊斐尔的小说富于诗意和哲理，笔触轻灵飘逸，文风素雅，结构纤巧，人物鲜活。她的小说中很难见到人物众多、触目惊心的生活场面，也很少宏大的构思，但她非常注重文字的色彩美和深刻的心理分析，在这之上，又常常笼上一层淡淡的忧郁、哀怨。这些特点同样适用于萧乾的部分小说。再者，萧乾像曼殊斐尔一样，常把作品当抒情散文诗来写。曼殊斐尔的有些小说是通过儿童的眼睛，儿童的心灵去观察，感受周围的成人世界。萧乾的小说《篱下》、《矮檐》等许多篇小说均属此类。当然，很难肯定地讲一个作家是受了哪位作家的影响，但无疑，萧乾创作中诗意语言的运用，多少是受益于曼殊斐尔的。同时期，德国小说家特奥多尔·史托姆的《茵梦湖》和歌德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给萧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两部也是诗意小说。《茵梦湖》缠绵悱恻的感情抒怀，语言的朴素优美，写景状物的生动自然等特色，都注入过萧乾的小说。

“罢工”失败后，萧乾又回到崇实中学。他成了学校的活跃分子，经常把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带进学校，参加了读书会，与会员互通书信，可后来这些书信都落到警察手里。萧乾还和几个小伙伴组织起“少年互助团”。在一个星期六，萧乾离开学校去看堂兄，被两个便衣抓进了拘留所。是他的洋嫂找到曾在地毯厂用金属把打过他的洋校长威廉·格列斯丁先生把他保释出来。不久他获悉，倘若不是保释，获救的机会极微，因为那年月无法律可言，而那又是个可以不审即毙的地方。

1927年北伐军到达北京，萧乾又兴奋起来，参加了一次持续到天明的灯笼游行。后被推选为崇实学生会主席。他以为革命真的成功了。不久，他认识到，这仅仅是旗帜的变更，赶跑了张作霖，又换上青天白日旗，暴政依然。1928年冬，萧

乾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，却被崇实以“闹学潮”的罪名开除了。接着，他就听说自己上了市党部的黑名单，无暇多虑，便跟一位潮州籍华侨同学南下岭南，在广东汕头落了脚。这时，他改名萧若萍，很快在一个小岛上的角石中学谋得一个教国语的职位。在那里，他初饮爱的苦杯，与一位女教师相亲相爱，在幽静，空灵、美丽的“梦之谷”里，情意绵绵，互吐爱慕。”但是一只大手硬是把她攫了去。那只大手是沱江电船老板，长途汽车公司的大股东，她教书的那家小学的校董——更重要的是，他是‘市党部’的什么委员。是初恋，也是脆弱心灵上一次沉重的打击。”《梦之谷》就是根据这段初恋的悲剧故事写成的。

在文学表现的所有感情中，爱情最引人注目；而且，一般来讲，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。了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及表现方式，对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个重要因素。从一个时代对爱情的观念中，我们可以得出一把尺子，可以用它来极其精确地量出整个感情生活的强度、性质和温度。萧乾从自身失败的感情经历中得出：在现实生活里，有情人不一定能终成眷属；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，那个社会，穷人连把握自身命运，选择人生，自由恋爱的权利都没有。

与其说《梦之谷》是部小说，倒不如说它是一首优美、恬静、柔和、哀婉，冷艳的长篇抒情叙事诗，充满了谐美的田园情趣，流露出作者对自然、对人情的感性理解。它是浪漫情调与感伤色彩的调和，文字富于音乐感，对男女恋情的描写，像来自天国的竖琴发出的奏鸣，又像一泓涓涓细流，在读者的心底流淌，泛起涟漪。全篇以悲剧结束，哀感动人。

萧乾承认，写作《梦之谷》是受了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，诗人拉马丁的小说《格来齐拉》(Graziella)的影响。三十年代，他曾把陆蠡译的《格来齐拉》一连读了好

几遍。七十年代末，有位挪威汉学家写信给萧乾，问他创作《梦之谷》是不是受了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（V. Woolf）的影响，他予以否认。他说1937年春写《梦之谷》时，只读过一本完全不代表她风格的《弗勒施》。及至他在英国研究心理小说时，已停笔不写小说了。“1928年冬去汕头那回，我初次见到海。兴奋啊，陶醉啊，我对海有了感情。《格来齐拉》中的海景和那个玲珑可爱的女孩子吸引了我”。离开汕头以后，感伤的初恋一直像隐蔽的生命一样，在他的体内蠕动，拉马丁的《格来齐拉》使他迸发创作热情，文思如潮，恋爱悲剧从笔端流了出来。

《格来齐拉》和《梦之谷》都是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，以娓娓动人的叙述，将男女主人公的恋情与美丽的自然景色和谐地交融在一起，展现令人心酸落泪的爱情悲剧。浪漫主义的本质是爱情。对浪漫主义者来说，爱情即道德。“浪漫主义的实质不是艺术，而是淹没在无限之中，在无边际的想象力之中的热情”。两位作家都是在这种热情中揉进了浪漫的感伤。

两部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讲述自身经历的方式来写，感情就更显得真挚生动。《格来齐拉》的男主人公“我”是个十八岁的青年，萧乾在角石教书时也是十八岁。这当然纯属巧合。

《格来齐拉》写“我”和朋友自法国到意大利旅行的经历。饱览罗马风光，畅游美丽的那不勒斯海湾以后，来到风光明媚的伊斯基亚岛。“我”与善良、纯洁的渔家少女格来齐拉一见钟情。她对“我”一往情深，痴心相爱，为爱情不惜牺牲一切。“我”生病时，她为“我”送来鲜花；“我”为她读动人的故事，她激动地流泪；他们经常来到海边眺望大海，柔情蜜意，互吐情素。没有一点肉体的欲念，有的只是纯情，圣

洁的爱。不久，家里来信催“我”速归。母命难违，“我”只好给格来齐拉留下一封充满柔情的信，同朋友一起回了法国。格来齐拉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她一遍遍地为爱情祈祷。来信中，她也是充满信心地等待永恒爱情的降临。其时，她已病得很厉害，生命垂危。当“我”最后一次收到信时，她已死去。“我”带着内疚、自责的心情写了一首长诗《初悼》，算是用泪水补赎十八岁时的那颗冷酷、负情的心所犯的罪过。这里是“痴情女子负心汉”。到了《梦之谷》，变成“薄情女子痴心郎”。

《梦之谷》是写朋友带“我”到汕头后的经历。“我”因在信中骂耶稣圣诞被校方开除，飘泊到汕头。人生地疏，言语不通，尝到了鲁宾逊式的荒凉。为了生存，“我沿街推销着自己”，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被一所海滨中学聘为国语教员。为推广普通话，在学校中成立了“天籁团”，组织上演契诃夫的独幕剧《求婚》，并请邻近师范学校长着一对“秀丽如水的眼睛”的盈姑娘担任女主角。“我”为她善良、充满了母性的笑容所打动，为她出色的表演所倾倒。“我”第一次看到“那么美丽的愤怒”。演出获得成功。三天以后，在师范学校的芭蕉林里举行了庆功的茶话会。“我”唱的一曲凄惨的北京民谣“小白菜”勾起她的伤心往事，她隐在芭蕉叶下呜咽着哭了。原来，她有一个荒唐的爸爸和狠毒的后娘，是一个“善良”的地方绅士资助她上了学。而“我”是个父母双亡，一无所有的人。相同的命运，使他们一见钟情，心心相印。虽然这时刘校董还没出场，但已给爱情的“梦之谷”投下了无法驱散的阴影。他们在“镀了银的日子”，徜徉在爱的甜蜜里：在星光下的海边散步，在硕大的木棉树下切切私语，坐在山坡上遥望大海，憧憬着梦幻的未来。“我”与盈相约，“我”回京读大学，等挣够了钱，还清刘校董的七百五十元债务，一起

去南洋。“我”在北平读书时，刘校董开始逼盈为妾，为把盈从火坑中拯救出来，“我”借了五十五元寄去，结果被原件退还。于是，“我”踏上感伤的行程，几经辗转，才在石埔镇的进德小学找到盈。这时，她似乎已变成另外一个人，“我”以为她变了心。她深知刘校董有县党部作靠山，有枪有丁，两个根本无法逃脱。最后，她留下一封信：“我无法同你走，原谅我，我有走不开的原因……见此信，你务必乘原船即刻离漳。如你心上还有我时，答应我这回。最后的一回了。一个女人不值一条命”。而“我”只剩一颗被痛苦撕碎了的心。

对比来看，《格来齐拉》和《梦之谷》这两首爱情悲剧，都是写纯情少男少女间美好的初恋，他们最后都未能结为连理。《格来齐拉》中，扼杀美好感情的元凶是那个社会秩序和世俗等级观念，因为“我”是个绅士，格来齐拉是个渔家女。《梦之谷》里，毁灭甜美恋情的罪魁是那个为恶霸刘校董提供温床的黑暗社会。

作为小说家，萧乾和拉马丁同样注重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物内在的情绪，感情相生相衬，产生了感人的艺术力量。《格来齐拉》的末尾，“我”在十二年后重返那不勒斯，去寻访格来齐拉的遗迹。旧有的一切都像秋菊一样凋零了，但岁月可以抹掉地上的事物，那初恋的印迹却永远铭刻在“我”的心中。“我”忆起与情人相恋的日子，心底永存着一个泪泉，泪水浸湿了思念。一次，“我”在教堂瞥见另一个少女的棺木，便又想起了格来齐拉，久久地流泪。

在《梦之谷》的序幕一章，“我”是在五年后重返南国海滨，去寻觅破碎了的爱情梦。一木一石，令“我”生情，情侣的容貌已变得模糊一片，刻在硕大苦奈树上两个人的名字也已被野禽啄得看不清。“我”想找什么把它填上，终于又不忍拆毁蒲虫的家。它们还需要一个栖身的地方啊，让它们就

在那块枯死的痕迹上生存着吧。“我”随即感悟到，一棵木本植物要比青春期的海誓山盟长寿多了。苦奈树的枯老更衬出“我”一颗伤感，失落，衰死的心。芭蕉树下的私语，木棉下的幽会，都如梦一般消失了。在这里，萧乾是把对“我”的心理刻划同景物的象征性暗示交织在一起，使作品产生了浓郁的象征气息。

在形象描写上，萧乾不像拉马丁那样，从正面以浓彩的面笔为格来齐拉绘制一幅美丽动人的油画，他只是用感觉性的文字为盈勾勒一幅美丽的线条。“天下还有比她再漂亮的女人吗？本来为上浅下深的制服切成两断的苗条身段，如今穿上了那楚楚服饰，微露着一牙莹白胸脯，显得多么飘逸娉婷。她简直不该作这小气女人的面色，这明明是朱立叶的化身了”。萧乾在以后的新闻特写里，对人物形象的描绘，大多采用这种白描式的简笔勾勒，言语不多，却分外传神，很容易在短时间里起到打动人心的作用。在这里，拉马丁和萧乾把两位少女写得那么纯洁、天真、善良、美丽，富于少女特有的魅力。她们同样热爱大海，热爱生活，都曾给“我”带来爱的温馨和柔情。所不同的是，格来齐拉最后为爱情埋葬了少女的芬芳，而盈却无情地抛弃了“我”。

《梦之谷》与《格来齐拉》同属抒情写意小说，语言优美，幽丽俊逸，富于诗的意境。萧乾常把语言比如画家的线条和音乐家的旋律，他努力以“唯美”的文学反映现实人生，而没仅仅陷于唯美主义的泥淖。两篇小说对大海都有非常出色的描绘。在他们笔底，大海充满了生命力，随着人物心理情绪的变化，大海也发出不同的鸣响，时而热情、奔放，时而狰狞、可怖。在两篇小说中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大海形态和气势上的变化成了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晴雨表。这是自然与人心的交流。橄榄树林的风鸣，海岸边的涛声，皎洁的月夜，

伴着情侣的柔情蜜意。阴霾的云彩，咆哮的黑浪，衬出主人公的无比伤感。

大学生涯

1929年夏天，萧乾回到北平，暂时进入不要中学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，听的全是不合他口味的金石学，音韵学，古代批评史等课程，只有从清华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开的现代文学课深深吸引了他。杨振声是火烧赵家楼的“五四”闯将，萧乾文学路上的启蒙良师。当时，杨振声主要讲了鲁迅的《呐喊》、茅盾的《蚀》、蒋光慈的《少年漂泊者》、郁达夫的《沉沦》和沈从文的《月下小景》。同时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、哈代的《还乡》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等世界文学的经典名著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，并对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。

如果说1926年北新书局的学徒生涯，是萧乾接触新文艺的起点，那杨振声精彩纷呈的现代文学课，仿佛是为他织就的一幅新奇瑰丽的文艺地图。杨振声有着渊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，讲课娓娓动听，十分引人入胜。萧乾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，杨老师那颀长的身材，慈祥友善的面容，富于幽默机智的神态，以及令人感到纯朴亲切的胶东口音，永远留在了萧乾的记忆里。

正是在这一时期，萧乾结识了具有激进革命思想，对他起过不少影响的杨绛（后改名叫杨刚）。她在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，当听说萧乾1926年因参加共青团被捕过，便试图

通过向他宣传革命道理，把他引上革命之路。她一本本地借给萧乾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书，可他怎么硬了头皮也读不进去。他满脑子装的尽是漂泊，流浪，对革命早已冷淡，那些枯燥的说教性理论引不起他的兴趣，他渴望做一名内心有所追求，行旅人生，不带“地图”（即舍弃教条，主义的羁绊）的旅人。

有一次两个人的圆明园散步，杨刚责问萧乾：“这么重要的理论，你为什么读不下去！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，这是革命真理！”

“理论，理论，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。这代替不了旅行。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，我要采访人生！”萧乾赌气说。

“你就这么横冲直撞，不带张地图？”

“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，而且更不平淡，更有趣，更富于冒险性。”

“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，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，给老虎吃掉。”杨刚最后警告说。

萧乾同杨刚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杨刚自杀。这不能不说是个讽刺，满脑子革命“地图”，政治信仰，从青年时代就与大地主家庭决裂，走上寻求革命真理道路的坚强女性，反而走上了绝路。

杨刚实实在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而当时读过拜伦、雪莱的萧乾，则是个极具浪漫思想的理想主义者。或许萧乾从年轻热情的雪莱诗歌中找寻到一颗不肯宁静的灵魂。雪莱对自然的歌颂，对阳光的热爱，对大海的礼赞，对黑暗的抨击，对未来的陶醉，都在萧乾的思想中激起了共鸣的浪花。雪莱渴望着自由的爱情，对人类未来充满希望，内心深处却浸透着一一种悲哀，他宁愿过一种漂泊放浪的生活，去忍受那难熬